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全球性问题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王义桅

观察者说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还对全球经济、金融、政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提出“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四点倡议，为全球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给出了中国方案。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此前称，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其实，在疫情影响下，不只是全球化的规则正在改变，全球化的内容也正在改变。具体来看，疫情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了我们启示：

第一，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而人的全球化则更多体现为地球村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疫情正在全球蔓延，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是全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关系，也不再是“你与我”的关系或者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关系，而是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只有共同战胜疫情，人类才能安全，更加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

第二，在全球性危机面前需更多关注那些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对于有效防控疫情来说，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或者较为薄弱的环节，决定了人类战胜病毒的进程。如同木桶装水，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在应对疫情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援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在采取行动自救的同时，也应向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入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和经济方面的关注，因为这些国家所受冲击更具破坏性、灾难性、持久性。正因如此，近日，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二十国集团采取行动为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以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此，习近平主席在此次发言中强调，“要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要保护妇女儿童，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三，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协调。当前，世界既面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又面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巨大风险，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社会与就业危机。对此，习近平主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具体来看，需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以此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在此次疫情给我们的诸多启示中，认识到人的全球化正在形成，尤为重要。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人的全球化有其内在逻辑：

——我健康，你才健康；你安全，我才安全。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世界安全，中国才安全；中国安全，世界更安全。对于国外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感同身受，主动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据3月3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中国政府已向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资援助。

——国际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必然。面对疫情，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需要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停留在国家单元的国际关系思维里，对人的关注不够，认为人只是劳动力、旅游者等“生产—消费”因素而已。面对人的全球化，我们需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而这应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不能只思考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等问题。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

总之，人的全球化进程，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何德旭 冯 明 提出：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货币政策要有力有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经济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各主要经济体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纷纷调整经济政策。美联储在3月23日宣布了“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即不限量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采取了类似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以应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尽管各国在调整货币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自身国内的情况，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溢效应。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需相机而变，在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同时，做好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需着眼于积极应对疫情对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冲击，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更加灵活适度，更加强调和注重用好结构性工具、应对结构性冲击、化解结构性难题，及时、有力地为宏观经济稳定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其一，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保持稳健，不能“大水漫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应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在近期特殊形势下，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考虑适当高一些，以便在疫情和外需下滑影响下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以及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

其二，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一方面要将促进就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另一方面要关注物价的结构性走势，既要防止食品等民生消费价格过快上涨，又要保障工业领域的生产经营正常运行。

其三，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强调更加注重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到有收有放、有的放矢。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减压和纾困；对疫情造成的产出和就业缺口，要通过支持其他领域发展来进行对冲和填补。

其四，必须强调底线思维和风险防范。防止资金流向产能过剩行业，加剧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具体来看，可考虑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一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债券市场利率等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二是注重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对受疫情和外需下滑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减压和纾困；三是加大货币政策稳投资的力度，特别是要将扩大有效投资与补短板结合起来，重点投向需求强烈、供给不足的领域；四是更加注重支持就业，可考虑设立专门针对劳动力密集行业和重点用工行业的定向“就业借贷便利工具”；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做好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肖 伟）

调查研究

以数字化制造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周维富

数字化制造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基础，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来提升产品设计、制造和营销效率的全新制造方式，包括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工艺、数字化加工、数字化装配、数字化管理等。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数据资源日益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化制造也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

发展数字化制造是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数字化制造作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型制造和智能制造。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质量，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快发展数字化制造，加紧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发展数字化制造是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制造以生产要素的数据化为依托，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要素，整合优化企业的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供应、产品制造和市场营销与售后服务等主要产业链环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发展数字化制造是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数字化制造的本质，就是增加信息与知识要素在整个制造系统的流转速度，以此来促进地域空间分工细化与区域间交易效率的提升，优化区域间的分工结构，进而实现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数字化制造不仅可以加快钢铁、石化、纺织等传统产业的工艺技术改进，丰富产品功能，提升产品附加值，而且可以显著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步伐，缩短科技成果中试和产业化的时间周期。

发展数字化制造是培育制造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一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大(大数据)智(人工智能)物(物联网)云(云计算)”为技术基础、以海量数据互联和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化制造浪潮，正在推动制造业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等制造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从实践看，数字化制造能够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高度融合，形成新的数据变现模式，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活力。

我国发展数字化制造具备一系列有利条件

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快速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等，都为我国发展数字化制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首先，体量巨大的制造业规模为数字化制造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持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门类最全的国家。但是，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18年底，我国制造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45.9%，数字化设备联网率为39.4%，都比较低。未来，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还是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都将对数字化制造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

其次，快速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化制造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推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相结合，打造联通全国制造业的人、物、信息交流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发展数字化制造的成本，这是发展数字化制造的重要基础设施保障。近年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移动电话基站841万个，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750万公里，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4.49亿户，4G用户总数达到12.8亿户，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力越来越强。

再次，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为数字化制造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在技术研发、成果应用、重点领域突破、国际交流合作、组织保障等诸多方面都给出了制度安排，发展数字化制造的政策保障越来越有力。

把握好数字化制造发展的着力点

发展数字化制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着力点，精准施策。

一是要以数字化思维分析研判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和新机遇。数字化思维以互联共享为原则，强调新资源的创造和资源的共享，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奉行质量第一、效益至上，数字供应链和新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需求导向、客户为本。对此，企业需切实提升对数字化转型的认同感，培养数字化思维，培育数字化能力，建立起可持续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从传统供应商转变为整个生产过程价值创造的合作者。在塑造竞争优势方面，要从自给自足转向开放合作；产品设计开发方面，要从线性开发转向快速试验；工作职能方面，要从机器替代人转向人机互补合作；信息安全方面，要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应对。

二是要着力促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势在必行。要加强制造业与大数据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把握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动态演化路径，厘清大数据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机理，找出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主要矛盾，合理有序地推进大数据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要深入探讨制造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特别是企业应大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三是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进程，提升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的融合度与渗透力。数字化制造是释放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体系重构、流程再造，形成新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化车间、数字化企业，形成新的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实现模式；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加快发展数字化平台经济，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模式，创新发展新商业模式，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升级，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四是要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发展的生态系统。数字化制造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加快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为数字化制造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体系和生态系统。一方面，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体系建设。以提升工业互联网核心软硬件创新能力为引领，突破底层操作系统、工业大数据、平台管理、核心工业软件、智能传感器、建模分析等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应用推广，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促进制造业全要素连接和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数字化制造发展的政策体系。健全和完善适应数字化制造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为数字化制造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同时，还需着力完善支持数字化制造发展的制度体系。制定数据采集、共享开放、确权、流通、交易、安全等多方面的相关制度，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规范数字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等行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执行研究员）

实践真知

提振消费 需借助数字化力量

□ 耿 阳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进一步采取务实举措，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3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也纷纷出台释放市场需求和提振消费的有力措施。其中，发放消费券、特别是电子消费券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手段。

消费券是政府发行的可以购买消费品的票证。有研究表明，发放消费券对商贸行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在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的背景下，发放消费券是各地有效提振消费的有力举措。

不同于以往的是，近期地方政府纷纷与电商平台携手发放电子消费券，借助数字化力量促进消费，这使消费券的发放变得更加高效、透明。一方面，电商平台具有凭借大数据精准连接供需双方的优势，能帮助政府更高效便捷地派发消费券，并实现政策结果的可追溯，有效解决以往对消费券发放效果的评估较为滞后且准确性难以考量等难题。另一方面，发放电子消费券还能显著降低成本。以往仅仅是消费券的印制、消费券公共平台的构建以及相关防伪技术的研发等，便需消耗10%至15%的成本。以知名生活服务平台美团为例，目前，美团已协助银川、南京、长沙、沈阳、柳州等地政府派发消费券，消费者可在美团、大众点评APP上的活动专区领取消费券，此举带动消费的效果十分明显。在银川，有的餐馆80%的客人都在使用消费券结账。

近段时间，人们对发放消费券有一些讨论，这对促进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合理确定消费券的发放种类、金额和期限都十分有益。不过，一些观点也表现出人们对消费券这一事物的认识不足。

消费券具有提振消费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应该以哪一种功能为主，常常成为讨论的焦点。当前各地发放消费券，是政府为应对疫情冲击而采取的手段，目的非常明确。当然，消费券在客观上也能起到社会救济的作用，但这并非当前政策发力的重点。因此，消费券涉及的消费品，应该选择产业链上游带动作用强或横向关联行业多、消费弹性大的品类，避免选择缺乏消费弹性的生活必需品。比如，刺激餐饮消费会带来商户加大食材采购，利好上游种植生产、运输流通行业，而餐饮业又恰恰是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之一。

有观点认为，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不如减免企业税费的效果。应该看到，两类政策的受惠对象不同、见效快慢有别，并不存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实际上，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已出台多项税收和社保的减免政策来为企业减负。

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发放消费券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问题。国内外经验表明，消费补贴政策在短期内或多或少会带动消费增长，但也必须看到，其对维持消费增长的效果是有限的。就目前而言，餐饮、住宿、健康医疗、休闲娱乐、出行等消费券支持的领域，不仅可以实现消费回补，还有望实现消费升级。当然，消费券对消费者来说属“意外之财”，不能改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而不能带来消费大幅度增长。正因如此，消费券这个“弹药”需要在恰当的时机集中“打”出去，才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总之，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经济，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在众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时，提振消费就意味着扩内需、稳就业，有助于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长期来看，要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切实推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也更有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苏红键 提出：

切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了全面推进期，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快速融合。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向乡村的拓展以及各类智慧应用功能在乡村的实践，为数字乡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也要看到，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效解决。

具体来看，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设计，还处于各地自主探索阶段，各类智慧应用功能也还处于各自分别应用的状态；智慧城乡建设差距较大，数字乡村建设存在地区不平衡；数字乡村建设的要素支撑有待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明显不足。

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要提高农民获得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要在现有农业农村信息化规划和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强整体规划设计，推动示范、试点与自主探索相结合，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搞建设，各地差异化的条件决定了多样化的推进模式，需在整体设计基础上，尊重各地差异，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乡村应用功能的设计与创新；要促进智慧城乡建设，应该看到，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智慧应用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手段也是目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就是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过程；要促进制度创新和应用创新，引导多方合作、参与，积极创建有利于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在智慧城市应用体系拓展基础上探索、创新、开发符合农民需求和乡村发展需求的智慧应用功能，还要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探索新技术在乡村的应用。

（肖 伟）

本版编辑 栾笑语